

中国近代经济史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

冯元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创办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洋务派进行“求富”活动的中心内容。因此进一步研究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于评论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是有意义的。

一、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以往关于洋务运动的论著中，多注意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而较低地估计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以为民用企业是围绕着军事工业而建立起来的附属物，所以就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一个反动的、买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的结论。其实，纵观洋务运动的始终，它不完全是“以军事为中心”，尤其在中期和后期，民用企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军事工业，而成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相反，军事工业的地位越来越不如民用企业的重要。民用企业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式的生产方式，在旧中国，这种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方式，有着广阔的发展前程。

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军事工业，一类是民用企业。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间，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共五十一个，其中民用企业占了三十二个，军事工业仅十九个。民用企业不仅从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且在规模和投资方面也超过了军事工业。

洋务派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在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的。从一八七二年办轮船招商局开始到一八九五年的二十多年间，洋务派集中主要力量办民用企业。甚至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种类型的民用企业仍陆续不绝，到二十世纪初，民用企业发展到四十个，又比一八九五年增加了八个。由此可见，民用企业逐渐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随着民用企业地位的不断变化，那么，洋务运动的性质也势必会发生变化。

我们再从洋务派在兴办民用企业时所花的精力和所下的决心来看，也足以证明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地位之重要。他们把办民用企业视作为实现“自强求富”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此，洋务派头子为此而竭尽全力。李鸿章给山东巡抚丁宝楨的复信中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万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张之洞也为当时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大声疾呼：“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为洋务派把办民用企业当作克服危机、实现“求富”的主要途径，所以他们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冲破许多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陆续办起了一批近代民用企业，创建了我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几经波折，走了不少的曲折路程，尤以一八九四年的上海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和一八九〇年的湖北炼铁厂最为典型。

李鸿章于一八八二年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集股50万两，占地三百多亩，到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产量“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广。”可是好景不长，由于管理不善，百弊丛生，于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九日，“清花厂起火，适值狂风，施救不及，厂货被烧。”十年心血付诸一炬，厂房机器设备被大火烧毁殆尽，损失达70余万两之多。这场大火对洋务派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是他们并未因此而灰心丧气，放手不干。一个多月以后，李鸿章上疏光绪皇帝，要求立即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并在各地设立分局。他说：“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由于洋务派的积极筹划，在大火后的第二年（1894年），上海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建立起来了，而规模和设备还超过其前身——上海机器织布局，拥有纱锭64,559枚，布机750台，实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近代大型的棉纺织厂。

洋务派骨干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对于创办民用企业也非常热心。特别在创建湖北炼铁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极为严重。刚筹划时，张之洞对资金的运用估计不足，以为“得二百万两即可周转，”结果“共耗用财五百六十余万两。”比原定资金多耗用将近两倍。这个巨大的差额，张之洞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加以弥补。资金虽然勉强拼凑成功，而资源、技术、燃料、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张之洞于一八九〇年三月筹划建厂时任两广总督，因而计划厂址设在广东，可是，到了同年七月，他被调任为两湖总督，而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对办炼铁厂不感兴趣，不愿在广东设厂，张之洞不得不中途将所购的机器设备转运湖北。幸得盛宣怀的热心资助，“盛乃贡献大冶铁矿于张（之洞）而移厂湖北之议遂定。”厂址既定，张之洞接着就派人到“各处寻觅矿藏，四处钻掘”，盛宣怀又得洋顾问李维格的建议，亲自出国聘请著名钢铁专家，经多方推荐，终于在英国钢铁协会请到一名叫史载德的钢铁专家来华协助建厂。史载德来华以后，发现张之洞从广东带到湖北的炼钢设备与大冶铁质不符，所以炼不出合格的钢材，只得再从英国购得“两座大的克利夫兰式的炼铁高炉及其全部装置、附属物、机器等件，每天大约能够生产100吨铁；一付全套的贝色麻装备，包括两个五吨的化成炉，以及熔铁炉、铸造起重机、鼓风机等；加上一套小的西门士马丁装备”。经这一改装，炼铁条件总算具备就全，于一八八四年六月廿八日开始炼铁，“生铁大炉先开一座，日夜出铁八次，共五十余吨，近来间有日出六七十吨者”。后来湖北炼铁厂由官办转为商办，在盛宣怀的经理下，规模又有所扩大，“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成为我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

前面所述的上海华盛机器纺织厂和湖北炼铁厂，是我国民用企业中轻重工业的大型工厂和代表性企业。洋务派为建立这两个企业而煞费心计，绞尽脑汁，最终取得了成功，可见洋务派对于办民用企业的决心之大，积极性之高，也足以表明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地位之重要。

二、民用企业兴起的必然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社会矛盾有了新的转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虽然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然而它的发展程度却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处于既勾结又斗争的矛盾状况之中,当人民的反抗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勾结是很紧密的,矛盾也就不十分激烈;但是,当人民的反抗运动被镇压下去、革命运动处在低潮时期,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显得激烈起来了。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已经窃取的种种特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且横生枝节,以各种借口不断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企图把中国变成他们武装占领下的殖民地。这就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且也日益严重地威胁和侵犯了清政府的种种利益,所以必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此时中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转化。就在这个时候,(1864—1895年)洋务运动特别是民用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民用企业的兴起与发展,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也可说它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矛盾新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一八七二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商品似潮水般的向我国涌来。到了一八八六年前后,我国海关进出口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一八八六年以前,每年入超不超过一千万海关两,其中大量的是鸦片进口而造成白银外溢。以正常的商品而论,土货出口仍比洋货进口占优势。一八八六年以后,入超大增,一八九〇年入超为三千九百多万海关两,比一八八六年增至两倍以上。其中外国商品输入中国便是海关入超猛增的主要原因,尤以棉布的进口量的增加更为惊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一八七〇年棉纺织品进口为2,200万海关两;一八八〇年为2,300万海关两;一八九〇年猛增至4,500万海关两,二十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资本主义列强在向中国进行大量商品输出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资本输出。一八六五年以前,外国资本已经开始在上海自行设厂,一八七六年英商怡和洋行又投资上海,筑成上海至宝山江湾铁路,其他外商也派遣矿师,在中国内地到处寻找矿产,准备投资设厂。于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城市先后出现了一批外商投资开设的银行,以及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列强的火轮洋船在我国的内河外海横冲直撞,垄断了水上的航运事业,李鸿章为此向光绪皇帝上疏说:“伏查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外国资本侵入中国,不仅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丧失,而且也使清政府的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当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步步加深的时候,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除了兴办一些军事工业以外,便着手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用洋务派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期渐收回利源”,“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使“外国所需予中国者,自行运贩,中国所需外国者,自行制造”,企图以此来克服由于海关入超递增而造成的财政危机。正如范文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棉货进口一直增加,‘国人竞购服之’。一八八〇年以后,有外国米粮进入中国。这种进口情形,显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结合的社会结构遭受严重的破坏,迫使中国统治者

(洋务派及其某些顽固派)不得不采取近代生产方式。”这种被迫采取的近代生产方式,就是兴办民用企业,就是地主阶级企图改变某些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而兴起的改良运动。

一八九三年李鸿章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丞宜购置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张之洞在一八九〇年创建湖北炼铁厂时也说:“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致滞销”,因而他主张“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杜外铁之来。”在洋务派看来,兴办民用企业是与外国资本争利,杜绝白银外流,克服财政危机的当务之急和最好的办法,并为此而自夸曰:“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若不早图变计,“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总之,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新转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地主阶级进行改良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促进了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基础的解体,给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些客观条件和可能。

三、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的关系

民用企业的产生,固然由于军事工业的影响,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社会矛盾发展对它的影响。因此,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之间既有其互相联系的一面,但又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围绕军事工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民用企业,主要是炼铁、炼钢业以及开矿业等。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的时候,深感原料和经济上的困难,为了支撑军事工业,所以首先着手兴办了一些与军事工业有直接联系的民用工业。钢铁、煤矿企业就是环绕着军事工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而主要也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然而,就是这类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企业,在实际中,它们除了军事工业所需要以外,也为民用企业或民间的需要提供燃料和原料。以煤为例,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至五六百吨之多,……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台湾开采的煤矿,每年达三万至五万吨以上,光是这两处的煤产量就已经可以满足清政府军需之外,还能把一部分投到市场上倾销,这样就减少了洋煤的进口。

第二类是建筹时打算既为军事又为民用,后来便逐渐转为以民用为主。这主要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方面的企业,尤以轮船招商局最为典型。该局创办之初,洋务派计划是“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运兵军火,借纾行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可是在实际上,对于军事并不象他们事先所打算的那样,如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紧要时刻,轮船招商局的船就不敢把援军装运到台湾、福建等地,而躲在港里,坐待敌人的封锁。在对于民用方面,招商局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它积极与洋商开展了竞争,打破了洋商垄断水运业务的局面,使洋商利益颇受损失。曾喧赫一时的太古、旗昌两洋行的运输业务,因“招商局既与争衡,即不能不随之跌价,既随跌价,即不能不共其亏折,”最后美商旗昌洋行只得将其十八只轮船归并给轮船招商局,实“为千百年未创见之事。”由于轮船招商局与洋商开展了积极的竞争,使“洋船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因与该局抗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八百十三万六千余两。”其次,为振兴商务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轮船招商局的创立,使“中国轮船可期畅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有利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并且,轮船招商局还先后派遣轮船,远航日本、吕宋、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海外商埠,扩大了

与太平洋沿岸各国的贸易。当时的郑应观说：“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给了它很高的评价。

第三类是与军事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企业，主要是棉纺织业。以兰州机器织呢局、湖北织布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华盛机器织布总厂）为代表的棉纺织企业的建立，一开始就无军事上之企图，所以它们较多的是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与私人资本结合起来并分利益。到后来，如湖北织布局、上海华盛机器织布总厂索性转为商办企业了。由于棉纺织业与军事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官方的干涉也较少，所以它们的发展速度在民用企业中遥遥领先，成为我国近代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述三种类型的民用企业，以第二、三类为主要，它们的特点是规模大、盈利高、成功的多、失败的少。它们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史上有其深远的影响。

四、结束语

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中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中期和后期，它们的发展比军事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洋务运动以军事为中心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洋务派兴起办民用企业的热潮，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企图改变某些封建生产方式的改良运动。这种改良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抵抗不住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吞和欺压的，它只有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民用企业就是从封建主义经济中脱胎出来的、借助于政权力量的资本主义，它在与外国资本的抗争中发挥了民族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发挥的作用。许多民族资本企业就是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招牌下幸存下来的，所以它对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其一定的作用。

全盘否定改良运动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列宁在《改革的时代》一文中曾经把统治阶级的改良运动称之为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并说：“这样的改革，总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民用企业的发展，它不仅在经济上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地盘，而且在政治上也促成了资产阶级的开始形成，这样为后来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造成了物质基础和政治因素，这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 《李文忠公全集》
- 《张文襄公全集》
- 《盛宣怀行述》见《愚斋存稿初刊》附录
- 中国近代史资料《洋务运动》第六、七册
-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